

血腥的盛唐

让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主角们，为您讲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、最璀璨也最黑暗、最血腥的朝代

一部289年的唐史，就是一部中国5000年历史的缩影。

7

大结局
盛唐结局是地狱



王觉仁 著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腥的盛唐 . 7, 大结局 · 盛唐结局是地狱 / 王觉仁
著. 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506-1719-3

I . ①血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—唐代—通俗
读物 IV . ① K242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5937 号

书 名 血腥的盛唐 . 7, 大结局 · 盛唐结局是地狱
著 者 王觉仁
责任编辑 王 卓 唐正申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凤凰出版社
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北京大兴区黄村镇李村
开 本 680mm × 990mm 1/16
印 张 20.75
字 数 320 千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1719-3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混沌贞元 /1

- 贤明宰相与糊涂天子
- 官场铁律：劣币驱逐良币
- 藩镇：疯狂奔驰的烈马（上）
- 藩镇：疯狂奔驰的烈马（下）

第二章 从顺宗到宪宗 /26

- 一场来势汹涌的改革
- 王叔文：举世浑浊我独清
- 飘风骤雨的“永贞革新”
- 宪宗：不要挑战我的底线
- 削藩不是件容易的事
- 一个心向李唐的人
- 革命尚未成功，李纯仍需努力

第三章 元和中兴 /67

- 宦官与文臣的博弈
- 两个宰相的斗法
- 魏博归顺·李绛罢相
- 武元衡被刺案
- 李愬雪夜袭蔡州
- 平藩的最后一战
- 中兴：一朵刹那凋零的昙花
- 宪宗之死

第四章 青春皇帝，玩乐天子 /112

- 蠢蠢欲动的河北
- 永不屈服的心
- 元稹的仕途：官场就是一张网
- 相权之争：渔翁得利的李逢吉
- 敬宗登基
- 一人独大的朝堂
- 玩乐天子：我的青春我做主
- 把娱乐进行到死

第五章 平藩、除阉、斗相，悲剧三重奏 /158

- 向藩镇宣战
- 志大“财”疏：文宗的软肋
- 牛李党争：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
- 流产的“除阉计划”
- 党争进行时
- 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
- 甘露之变：喋血大明宫
- 不共戴天的宰相恶斗
- 武宗登基

第六章 盛唐终结之前的回光返照 /217

- 强势宰相与超级宦官
- 仇士良：一个权宦的完美谢幕
- 李德裕的人生巅峰
- 宣宗登基
- “傻子光叔”的帝王之路
- 山河长在掌中看
- 大中之治：最后一抹辉煌
- 懿宗登基

第七章 一盘散沙的唐朝 /257

- 内忧外患的帝国
- 庞勋之乱：大唐的人心散了
- 僖宗登基：乱世小皇帝
- 黄巢：被社会遗忘的人
- 我花开后百花杀
- 狼虎谷

第八章 凄凉大唐晚景 /287

- 遍地枭雄
- 昭宗：孤独的拯救者
- 守望春天
- 灵魂中的七道伤
- 光化政变：天子成了阶下囚
- 流亡的路上没有方向
- 走向终点

后记 /317

第一章 混沌贞元



贤明宰相与糊涂天子

李泌的离世是德宗的损失，更是帝国的莫大损失。

不过，德宗是幸运的。因为上天除了李泌之外，还给他准备了另一位贤明的宰相。

他就是陆贄。

早在建中四年（公元783年），也就是德宗流亡奉天期间，陆贄就以一个普通翰林学士的身份担起了一个宰相的职责。当时，朝廷的许多大政方针都出自陆贄的筹划，德宗也对他言听计从，《罪己诏》的颁布即是其中典型一例。

所以，当时的陆贄普遍被人誉为“内相”。

但是，诸藩之乱平定后，德宗却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陆贄。

因为陆贄为人率直，言辞总是过于激切，经常让德宗很不爽。每次陆贄进言，德宗都会感到宝贵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。此外，一帮嫉贤妒能的朝臣也时常在天子耳边嘤嘤嗡嗡，编排陆贄的不是。因此，即便陆贄德才兼备、人望颇高，却始终与宰相之位无缘。

李泌去世后，户部侍郎窦参、太常卿董晋继任宰相。窦参为人刚愎自用，凡事独断专行，而董晋却是个唯唯诺诺的老好人，朝政大权自然

都落到了窦参一个人手里。窦参不仅专权，而且还纵容一帮亲信贪污纳贿。德宗屡屡警告，可他却置若罔闻。德宗忍无可忍，只好在贞元八年（公元792年）四月将其罢黜。

窦参一贬，朝堂上就只剩下董晋这个形同虚设的宰相了。要想让帝国朝政尽快回到正轨，清除窦参留下的恶劣影响，就必须物色一个刚正贤明、德高望重的人来当首席宰相。

直到此刻，德宗才想起了与他共过患难的陆贽。

这一年四月，被冷落了十年之久的陆贽终于登上了早该属于他的宰相之位。

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终于有了付诸实践的机会，陆贽自然是全力以赴。就在拜相当月，陆贽便奏请德宗改革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，也就是把原来由宰相一手包揽的人事权下放到各个政府机构，由各台省的长官自行推荐人才担任下属官员；但是在任命状上，要注明推荐人的职务和姓名，以便将来考察被推荐人的政绩，从而对推荐人进行相应的奖惩。

陆贽之所以推行这项人事改革，目的就是要避免因宰相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任人唯亲、专擅朝政、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；而让熟悉本部政务的台省长官公开推荐下属官员并承担相应责任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行政公开化，消除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的可能性，尽最大努力做到唯才是举和量才录用。

陆贽这么做，显然极大地削弱了本来属于宰相的权力。

而此时此刻，削弱宰相权力就是在削弱他自己的权力。

仅此一点，我们就不难看出陆贽的坦荡襟怀和无私品格，更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执政者的清明理性和廉洁精神。

无论古今中外，要判断一个执政者（或执政集团）是否合格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——为了维护国家、社会和民众的利益，这个人（或这个集团）愿不愿意用权力的右手砍断权力的左手？或者退一步说，愿不愿意让自己手中的权力受到严格的制约和监督？

这个要求貌似很高，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，这其实只是对执政者最基本的要求。因为，权力的属性是公有的，从来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私有财产；无论这个人或这个集团用什么方式获得权力，都只是权力的“代理人”，而非“所有者”。

虽然陆贽不懂得现代政治文明，但他本着自己的良知做事，却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。陆贽之所以愿意削弱手中的权力，就是因为他并不把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。因此，为了维护朝廷和国家的利益，他当然乐于为权力寻找一种更有效、更合理、更透明、更公正的运作方式。即使这种方式是用自己的右手砍断左手，即使这么做伤害了他个人的利益，陆贽也在所不惜。

毫无疑问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执政者。

对于陆贽推行上述人事改革的目的，以及陆贽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坦荡和无私，德宗当然都看得很清楚，所以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改革方案，于这一年五月下诏颁行。

然而，仅仅数日之后，便一再有人跟德宗打小报告，说各台省长官举荐的人都是徇私受贿的产物，并不是真正的人才。德宗一听，赶紧私下告诉陆贽：“自即日起，各台省官员的任命和调动，都由你自己做主，不要交给各部门长官。”

陆贽闻言，随即连上三道奏疏。

第一道奏疏说：“本朝自开国以来便有规定，五品以上官员的选拔由宰相合议，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铨选，然后上奏皇帝批准，下诏任命。但后来佞臣当政，废除了宰相合议制度和公开推举制度，单独行使权力，用以捞取个人利益，因此即便是品行才学出众者，若没有当时宰相同意，也得不到提拔和任用。这就是一直以来的弊政。”

第二道奏疏说：“自从陛下颁布人事改革诏书，被推荐的人才不过十几个，评议他们的资历和人望，并不逊色于同僚；考察他们的德行和才能，也没有发现什么污点和败绩。可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，却随口抨击，误导皇上的判断。由此可见，要让用人制度公正透明何其困难！臣建议，让那些抨击者提出具体的指控，何人受贿，何人徇私，然后交给有关部门严加审查，判断虚实。若确有其事，就对推荐人进行惩罚；若纯属诬告，就对诬告者实行反坐法。再说，宰相不过才几个人，怎么可能了解所有的人才？如果所有官员都由宰相亲自遴选，宰相势必也要辗转向各台省长官征求意见。如此一来，公开推选就变成了私下举荐，阳光政务就变成了暗箱操作（易明扬以暗投），任人唯亲的现象就会更多，流弊也会越来越严重。所以自古以来，只要是实行人事改革，就会

触及很多人的利益，因此不可能不遭到毁谤。”

第三道奏疏说：“今日之宰相，必是往日之台省长官；今日之台省长官，必是将来之宰相，只是官职有所变化，做事情的方式不会马上改变。既然如此，哪有当台省长官时没有能力推举一两个下属，一旦居宰相之位，便有能力遴选千百个官员？所以，若要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，就要由最高领袖选拔宰辅大臣，宰辅大臣选拔中层官员，中层官员选拔下级官吏——没有比这种层层负责的办法更好。总之，选拔人才的时候，接触面越广越好；考核他们的能力和绩效时，标准则越精细越好。这才是正确的用人之道。”

陆贽这三道奏疏，摆事实讲道理，把用人制度方方面面的得失利弊都分析得十分透彻，相信只要是脑袋清醒的皇帝，一定会采纳他的建议，把人事制度改革继续推行下去。

然而，德宗的脑袋并不清醒。

无论陆贽如何苦口婆心、据理力争，他还是执意追回前诏，罢废了这项新政。

德宗虽然迫于时势，不得不提拔陆贽为相，但是心里还是很不喜欢这个人。在德宗看来，陆贽身上的种种闪光点似乎都太过刺眼了。

就拿“清廉”这个品质来说，按理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点，没有哪个领导不喜欢自己的手下清廉，可德宗偏偏就是看不惯陆贽的清廉。

贞元九年（公元793年）春，德宗让人转告陆贽，说：“卿清慎太过！诸道馈遗，一皆拒绝，恐事情不通，如鞭靴之类，受亦无伤。”

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四）

你做人太过清廉和谨慎了！各道馈赠的礼物，你一概拒绝，恐怕不通人情，像马鞭和靴子之类的小东西，就算接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陆贽闻言，顿时哭笑不得。

面对这样的糊涂天子，他也只能再次不厌其烦地摆事实讲道理：“官员接受贿赂，就算只有一尺布，也算犯罪，必须惩处（根据唐朝律法，监守自盗者，一尺布打四十棍；受贿枉法者，一尺布打一百棍）。即便是低级官吏，也要严禁受贿，何况是身为百僚之长的宰相，岂可开此方便之门？受贿之门一开，欲望一定膨胀，一开始是马鞭和靴子，接下来就是黄金和美玉，眼前有种种诱惑，内心又岂能不乱！既然与人私

下收受结交，就不能不满足他的请求，于是涓涓细流汇成江河，江河泛滥遂至成灾！再说，若接受某甲的东西而拒收某乙的东西，则某乙必定会有怨言；若无论何人概不接受，大家便习以为常，又怎么会对宰相生出猜嫌之心？”

不知道陆贽的这番道理有没有说服德宗，反正仅从“鼓励宰相受贿”这一点来看，说德宗是糊涂天子就不算冤枉他。暂且不说大唐的律法对贪污受贿的惩罚是何等严厉，就算没有这些律法，一个皇帝也应该深深懂得“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”的道理。

当年太宗李世民得知一个官员受贿一匹绢，就大发雷霆，打算砍掉那个人的脑袋，没想到如今的德宗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主动劝说宰相受贿。太宗皇帝倘若地下有知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

虽然德宗只是劝宰相收一些马鞭、靴子之类的小东西，可就像陆贽说的那样，方便之门一开，谁的欲望不会膨胀？马鞭、靴子既然“奉旨”可收，黄金美玉凭什么不能“奉旨”而收？

正所谓窥一斑可知全豹。有德宗李适这样的天子，大唐帝国重回太平盛世的可能性即便不说是零，恐怕也是微乎其微了。

陆贽很不幸。他怀抱的是辅佐圣主的理想，可遭遇的却是糊涂天子的现实。在德宗手下当宰相，陆贽注定不可能有什么作为。

在陆贽前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中，大多数针砭时弊的建言献策都得不到德宗的采纳。陆贽的满腔热忱和宏大抱负，最终只能化为一摞摞厚厚的奏章堆积在天子的御案上，旋即又被塞进年深日久、汗牛充栋的宫廷档案库里，等待灰尘的覆盖和白蚁的蛀蚀。

一直到许多年后，有心人把陆贽的奏稿辑为一册，命名为《陆宣公奏议》，从而流传于世，后人才得以从那些发黄的书稿中，窥见一种清明透亮的政治智慧，并且感受到一种超迈高洁的人格力量。

在暗如长夜的贞元年间，在混沌不堪的中唐历史上，这样的智慧和人格力量虽然不曾照亮那个时代，但它们所发出的光芒却足以擦亮后人回望历史的目光。虽然谏言多数不被采纳，但陆贽却始终不肯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。左右亲信劝他不要总是犯颜直谏，而且进谏的言辞也不宜太过尖锐。陆贽淡然一笑，说：“我只求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所学，其他的事情在所不计！”

陆贽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可德宗却不能不计较他的天子尊严。

对李适来说，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，他总是在这面镜子前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照见自己的缺点和丑陋，这就使得皇帝到最后不仅是觉得丢了面子，而甚至于是感到愤怒了。相形之下，时任户部侍郎、判度支的裴延龄就让皇帝很有好感，李适跟他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在，就像他当年跟卢杞在一起时一样。

而这个裴延龄，正是卢杞当年在位时引荐的。



官场铁律：劣币驱逐良币

常言道名师出高徒，当初的卢杞最善逢迎，如今的裴延龄自然也是精于拍马。有一次，德宗打算重修京师的神龙寺，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，却遍寻不获，结果裴延龄马上说：“臣最近在同州（今陕西大荔县）的山谷里，发现了几千棵大松树，高达八十尺！”

德宗很诧异，说：“开元、天宝年间，千方百计在京师附近寻找大型木材，却一直找不到，为何现在忽然有了呢？”

裴延龄答：“天生珍材，往往要等到圣明天子在位时才会出现，开元、天宝年间，怎么可能找得到！”言下之意，如今的天子比缔造了开元盛世的玄宗还要圣明。

德宗闻言，表面上虽不动声色，实际上却浑身酥麻，受用无比。

当然，德宗之所以喜欢裴延龄，不仅是因为他很会说话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——裴延龄很会帮朝廷搞钱，尤其是帮皇帝的小金库搞钱。

贞元九年七月，刚刚当了一年财政大臣的裴延龄奏称：“臣自从就任判度支以来，查出天下各州欠缴的赋税多达八百余万缗，此外，已征收各州的交易税三百万缗，收缴的各种贡物折合现钱三十万缗。臣建议，在左藏库中另行设立一个‘季库’，对欠缴、耗损和盈余的账目每三个月清查一次；另外设立一个‘月库’，专门管理各种绢帛贡物，并每月核查。”

裴延龄这道奏疏相当于他上任一年来的工作报告，里头既发现了前任遗留下的问题，又总结了自己上任以来的工作成绩，并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议，看起来确实是个精明能干的理财高手。德宗看了

奏疏后非常满意，马上照准。

然而，裴延龄真的是理财高手吗？

不，他是个冒牌货。

他所发现的巨额欠税问题，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闻。历届财政大臣都知道这回事，可没人能把这笔款收上来。因为欠税的对象均为赤贫或破产的农民，所以这笔巨额欠款早就成了呆账坏账（徒存其数）。此事财政部门尽人皆知，可裴延龄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肆鼓吹，把它当做上任后的一大政绩。这件事除了忽悠一下外行人德宗李适之外，只能让内行人视为笑柄。

再来就是三百万缗的交易税。这笔钱其实左手收进来右手就花出去了（给用旋尽），到裴延龄汇报政绩时，这笔钱估计已经一文不剩，可他却还煞有介事地设立什么“季库”，好像国库里头的钱多得管理不过来似的。

最后就是管理贡物的所谓“月库”。这也纯属脱裤子放屁的无聊之举。因为绢帛贡品本来就是左藏库中的经常项目（皆左藏正物），何必多此一举，另立管理部门呢？

很明显，裴延龄之所以要脱裤子放屁，目的就是“虚张名数以惑上（德宗）”。这就像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人去拍相亲照，为了掩饰谢顶的尴尬，只好先把仅有的头发梳到左边拍张左侧照，再把头发全部梳到右边拍张右侧照，这样不管左看右看就都很帅了，其实他的秀发梳来梳去也就那么几根。

裴延龄就是拿着这样的“相亲照”博得了德宗的青睐和宠幸。“上信之，以为能富国而宠之，于实无所增也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三四）

裴延龄为了报答德宗的知遇之恩，除了尽力“充实”国库之外，当然也要尽力充实德宗的小金库。

可裴延龄实际上是太常博士出身，写几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还算凑合，要说扩大税源、增收财政，他压根就一窍不通，怎样才能让德宗的腰包鼓起来呢？

很简单，把国库的钱挪到天子的腰包里就行了。

怎么挪？

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挪，要有恰当的理由和说法。

作为一个擅长挪移大法的“半秃头”，裴延龄绝不会说右边的头发是左边梳过去的，而会说左边的头发非常富余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干脆梳一些过去给右边。再说了，就算是三毛，人家理发的时候也能理个“三七开”，即使再掉一根，人家还可以理个“中分”嘛，所以裴延龄头上的毛虽然不多，但也足够他左右倒腾了。

贞元十年（公元794年）秋，裴延龄向德宗奏称：“左藏库过去管理混乱，财物遗失很多，臣最近清仓核查，重新造册登记，居然在尘土中找出银子十三万两，另外还有绸缎、布匹等大量杂货，粗略估算，价值应该一百万钱有余。这些钱物本来已经遗失了，现在找出来，当然属于富余物资（羡余），应悉数拨入宫中内库，专供陛下使用。”

德宗笑了。

看来裴延龄果真是个理财高手！

然而，说左藏库的尘土里居然能找出十三万两银子和一百余万财物，基本上是无稽之谈。换言之，裴延龄这种行为跟明火执仗的抢劫毫无差别！有朝臣忍无可忍，立即上疏抗辩，说：“这些都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国家财产，每月都列表呈报，岂能说是‘羡余’钱物？请皇上即刻派人核查。”

陆贽也提出，应该让三法司（御史台、刑部、大理寺）对此展开调查。可是，德宗会同意复查吗？

肯定不会。已经落进口袋里的钱，哪个傻瓜会把它再吐出来？事情明摆着，虽然德宗不会傻到真相信尘土里会长出钱来，但他绝不可能去追查真相。

因为真相对他没好处。

裴延龄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公然炮制这样一个弥天大谎。

其实，早在几年前，当德宗准备起用裴延龄为财政大臣的时候，陆贽就曾指斥裴延龄为“诞妄小人”，坚决反对，可德宗却充耳不闻，执意任命了裴延龄。

现在，满朝文武虽然也都知道裴延龄是个小人，但大伙更清楚他是天子跟前的红人，所以几乎没人敢去惹他。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、京

兆尹李充、司农卿李銛等少数几个大臣，因职务关系经常跟裴延龄打交道，很清楚他玩的那些猫腻，因而时常向德宗举报。

然而，张滂等人也只是私下举报而已，从不敢公开弹劾。满朝文武中，唯一一个屡屡上疏弹劾裴延龄的人，就只有陆贽了。

贞元十年十一月，陆贽连续上疏，历数裴延龄的罪恶，痛斥其为奸诈小人，同时还把矛头直指德宗。他说：“陛下为了保护裴延龄，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，他势必以为什么事都可以瞒天过海，所以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，就当是他的政绩；把这里的财物转移到那里，就胆敢称为‘羨余’。愚弄朝廷，如同儿戏！从前赵高指鹿为马，鹿和马尚且是同类；如今裴延龄变有为无，指无为有，如此凶险虚妄，天下皆知。上至公卿大臣，下至小吏百姓，无不对此议论纷纷，但是亿万官民，能向陛下进言者又有几人？臣虽不才，但备位宰相，即便不愿开口，最后还是不能保持沉默。”奏疏呈上，德宗大为不悦，从此日渐疏远陆贽，却愈发宠幸裴延龄。

裴延龄当初被提拔时遭遇陆贽阻挠，早就对他恨之入骨，如今又屡屡遭其弹劾，这口恶气更是咽不下去，于是很快就发起反击，频频向德宗施加影响，怂恿他罢黜陆贽。

在陆贽与裴延龄的这场较量中，陆贽显然是居于劣势的，因为德宗并不站在他这一边。

贞元十年十二月，德宗终于下决心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，把他贬为太子宾客。

陆贽其实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。他唯一没有料到的是——自己居然会栽在裴延龄这种小人的手里。

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定律，叫“劣币驱逐良币”，意思是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劣币进入流通领域后，人们就倾向于将良币（足值货币）收藏起来，用劣币去交易。最后，劣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大，就会把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。

在政治领域中，这个定律其实同样适用。当君子和小人同在官场上时，君子凡事只考虑公共利益，因此必然不善于自我保护，并且容易得罪人，最要命的是得罪领导；而小人不管干什么都一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，因此更谙熟利益交换的原则，自然就更容易讨人喜欢，尤其是讨领导的喜欢。久而久之，小人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，君子的空间则会越

来越小。最后，君子只能被小人驱逐。

成功扳倒陆贽后，裴延龄再接再厉，又把目标转向张滂、李充、李銛，准备把这些告过他御状的人全部搞掉。他对德宗说，这三个人都跟陆贽结党，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。

德宗虽然宠幸裴延龄，但他也不想把打击面搞得太大，所以听过也就算了，并没当一回事。

裴延龄当然不会善罢甘休。

贞元十一年（公元795年）春，关中大旱，朝廷的财政收入骤然紧张起来，一些开支不得不缩减。裴延龄趁机缩减了军队的粮草，然后对德宗说：“陆贽、张滂等人失势以后，心怀怨恨，最近在大庭广众中宣称：‘天下大旱，百姓流亡，度支使克扣诸军粮草，军中的士兵和马匹都没有吃的，这事该怎么办？’陆贽等人散播这种言论，不仅是中伤朝臣，还想动摇士气和民心啊！”

德宗闻言，将信将疑。几天后，德宗到禁苑中打猎，护驾的神策军士兵恰好向他诉苦，说：“度支使最近一直没有拨发粮草。”德宗一听，确信陆贽等人肯定散播了蛊惑人心的言论，顿时勃然大怒。

这一年四月，德宗下诏，将陆贽贬为忠州（今四川忠县）别驾，张滂贬为汀州（今福建长汀县）长史，李充贬为涪州（今重庆涪陵区）长史，李銛贬为邵州（今湖南邵阳市）长史，把裴延龄痛恨的这些人全部逐出了朝廷。

陆贽从此远离朝堂，在偏远的蜀地度过了他的余生，再也没有回到长安。

裴延龄大为得意。他觉得如此一来，宰相之位肯定非他莫属了。

然而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尽管裴延龄处心积虑想搏出位，可多行不义必自毙，第二年秋天就身染重病，呜呼哀哉了。

裴延龄一死，朝野上下争相庆贺，唯独德宗一人哀伤不已。

毫无疑问，如果裴延龄不死，肯定会继卢杞之后成为德宗最宠幸的宰相。所幸老天爷开眼，早早就把这个坏得掉渣的极品小人收了，否则此人必定会像卢杞那样，把帝国朝堂搞得乌烟瘴气、鸡犬不宁，并最终祸及四方、贻害天下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德宗实在是很幸运。

其实，就算把德宗李适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，说他是个幸运的皇帝也并不为过。尽管从他即位的那一刻起，大唐帝国早已深陷藩镇割据的泥沼，他面临的是一个纲纪废弛、山河裂变的历史困局，但事实上，德宗李适并不缺乏与历史博弈的资本。进而言之，他所拥有的资本完全有可能使他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之主。

他的资本就是人才——文臣如李泌和陆贽，武将如李晟、马燧、浑瑊。然而，李适终究没能中兴李唐。

问题当然出在他自己身上。

李适一生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，就是他登基之初的那一番雄心壮志，可如此心志之所以横遭挫折并且迅速偃旗息鼓，除了藩镇问题积重难返之外，主观原因就是他的促狭、猜忌、所用非人而又执迷不悟。比如重用卢杞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，可直到诸藩之乱早已平定的贞元四年（公元788年），当曾经的用人得失和成败利钝都已相对明朗的时候，李适有一次和李泌谈话，却仍然在强调：“卢杞忠贞清廉、刚强耿介，人人都说他奸，朕却不这么认为。”

李泌当时的回答是：“人人都说卢杞奸，只有陛下不觉得他奸，这正是卢杞所以奸邪的证明。假如陛下早发现他奸，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？卢杞倾泄私愤，诬杀杨炎，将颜真卿排挤到死地，最后又激怒李怀光，迫使他叛变，幸亏陛下把卢杞流放到远方，否则大祸如何能止！”

李适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建中之乱，术士早有预言，说起来也是天命，卢杞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招致祸乱！”

李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要是把一切都归于天命，那教育、行政、司法，就全都沒用了。”

这场谈话显然并未扭转李适对卢杞的看法，否则李适后来也不会重用跟卢杞同属一丘之貉的裴延龄，更不会把公忠体国、德才兼备的贤相陆贽逐出朝廷。

一个人偶然被石头绊倒，那是运气不好，只要爬起来绕道走就可以了。可如果这个人坚持认为绊倒他的不是石头，而是老天爷，那他就会在这块石头上绊倒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

像这种人，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——无可救药。

一个无可救药的皇帝，纵然身边猛将如云、谋臣如雨，又能有什么作为呢？再多的猛将和谋臣，最终也只能一一成为被驱逐的“良币”。



藩镇：疯狂奔驰的烈马（上）

从历史的两头往中间看，德宗在位的整个贞元二十年，大唐帝国就像是一驾行走在混沌黑夜中的马车，看上去显得无生气而且疲惫不堪。虽然天下再也不像建中年间那么混乱，但是帝国的方方面面都看不出丝毫起色。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适就像历史上的每一个守成之君那样，浑浑噩噩、得过且过地守着祖宗留下的江山，既没有智慧和能力让它重绽盛唐时代的光芒，也不至于昏庸到把它失手打翻。

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样摇摇晃晃地依靠惯性在黑夜中前行。

如果说帝国是一驾马车，那么桀骜不驯的藩镇就是一群拉着帝国疯狂奔驰的烈马。尽管头上套着马缰、身上拴着车轭，可它们还是经常乱蹦乱跳，把老大帝国搞得险象环生、几欲倾覆。进入贞元年间，虽然相当多的藩镇还是野性未驯、我行我素，但毕竟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，只有“宣武”和“彰义”这两匹烈马最为疯狂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德宗朝廷疲于应付，伤透了脑筋。

宣武镇（治所汴州，今河南开封市）的乱子是从贞元八年（公元792年）开始闹起来的。这一年四月，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卒，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军方的意见，说：“调陕虢观察使吴凑过去接任，可不可以？”

宣武军方说可以，德宗松了一口气，赶紧命吴凑走马上任。

不料，吴凑刚刚走到半路，刘玄佐的女婿和侍卫亲军就突然发动兵变，拥立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留后，并磔杀数名倾向朝廷的文武将吏，劫持了朝廷派驻宣武的监军宦官，胁迫朝廷发布正式任命状。

德宗慌忙问计于宰相。当时的宰相窦参说：“宣武将领大多暗中依附平卢（淄青）节度使李纳，如果朝廷拒绝，恐怕宣武就会和平卢连成一气了。”

德宗担心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重演，只好息事宁人，正式任命刘士